

扩招背景下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研究

李莹¹, 王琦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 北京联合大学 管理学院, 北京 100101

作者简介: 王琦(通讯作者, Email: wq68986@163.com), 管理学博士,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乡居民机会不平等的生成机制、传导效应与应对策略研究”(22CTJ022)。

[摘要]本文借鉴机会不公平的“环境—努力”二元分析框架,从可及性、公平性与公平的可达性三个维度量化研究高等教育的城乡差异,并采用不同的分解方法探析背后的成因与机制。研究发现:扩招导致城乡内部高等教育可及性、公平性与公平的可达性不同程度地提高,其中城镇的变动幅度更大,扩招带来的利好更多地被城镇群体捕获,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可及性与公平性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城乡户籍导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并没有随着扩招的持续出现明显减弱。城乡公平的可达性差异中,扩招带来的规模效应占首位,机会公平改善带来的均等效应次之,环境因素本身的差异带来的结构作用较小则限制了农村居民公平可及性这一综合指标的改善。

[关键词]高等教育机会;城乡差异;高校扩招;可及性;公平性

[中图分类号] F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23)03-0077-08

高等教育既是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重要方式,也是改变个人命运、实现社会阶层跨越的典型途径。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推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幅提升,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迈入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变迁。但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大众对教育公平的诉求也在不断升级,教育部关于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连续多年提出要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但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户籍不仅是身份划分,其背后还集中体现了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的差异,如何推动城乡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可及地获得高等教育,对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分析框架

接受高等教育是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载体之一。我国 1999 年开始施行的高等教育扩招是继 1977 年恢复高考后最为重要的一次高等教育改革,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降低了高等教育入学门槛。在高等教育扩招背景下,教育机会获得是否得到优化?城乡居民入学机会差距是否显著缩小?上述关键问题还未得到一致结论:从实证角度既有研究发现扩招带来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扩大^①,也有研究发现扩招缩小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②,由于实证偏误导致正反意见相持不下^③。

① 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2010 年第 3 期;邢春冰:《教育扩展、迁移与城乡教育差距——以大学扩招为例》,《经济学(季刊)》,2014 年第 1 期;朱斌:《教育扩张、社会转型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迁》,《复旦教育论坛》,2019 年第 4 期。

② 乔锦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教育学报》,2008 年第 5 期;徐娜、张莉琴:《高校扩招对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设计的经验证据》,《教育科学》,2018 年第 2 期。

③ 陈林、万攀兵:《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得与失——围绕国内学术界三大争鸣的政策效应评价》,《中国人口科学》,2017 年第 1 期。

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教育公平,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存在差距,但差距本身并不一定代表不公平,其中关键在于形成差距的原因与机制^①。尽管不少研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分配存在不公平问题并分析可能的原因,大众也对之存在主观感知,但是学界尚未提出一个恰当的标准来衡量和描述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不公平程度,因此,难以做到科学、客观地判断。罗默(Roemer)总结和发展的机会不公平理论,并清晰地界定了个体责任^②,给出了清晰并实用的“环境—努力”(circumstances-efforts)二元分析框架。罗默认为分配结果是环境和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环境(circumstance)是指个体无法自我控制或社会无法问责、但又对分配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集合,最为典型的环境因素即家庭背景、种族等;努力(effort)是指社会能够问责、个体能够自我控制的影响结果的个体行为;分配结果可以是个人收入、教育、健康等。借鉴上述理论,本文将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定义为每个学生能否上大学不仅取决于个人学习的努力程度、天赋等,还受到社会阶层、家庭环境等环境因素影响的情形。

扩招对教育获取的影响与对教育机会公平的影响并非一回事。为了更直接量化扩招背景下城乡高等教育差异的变化,本文基于罗默的机会不公平理论,梳理并明确区分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努力程度与环境因素,从可及性、公平性以及公平的可及性三个维度来构建完整的分析框架,清晰地刻画扩招背景下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异大小与背后机制,从而对高等教育的城乡配置失衡问题进行全方位考察。

一是高等教育机会的可及性,体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适配程度。可及性反映高等教育机会供给的丰盈程度,可以预期,扩招后高等教育可及性有了大幅提升,但是城乡居民高等教育可及性是否同等程度提高还是未知。

二是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性,体现个体不可控的环境因素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中发挥多大作用。通过量化公平性,来回答如下问题:其一,我国城乡居民高等教育获得是否存在机会不公平问题?其二,城乡机会不公平程度有多大?扩招背景下,城乡机会不公平程度的演变趋势如何?其三,各类环境要素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三是高等教育公平的公平性,体现根据机会公平原则分配的机会数量。能否获得高等教育,同时取决于高等教育的可及性与公平性的高低。只有将提高可及性与更加公平地分配高等教育机会相结合,公平的公平性才能实现最大化。本文不仅量化公平的公平性程度,还会进一步分析公平的公平性变动背后的机制。

本文核心问题是剖析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与背后的原因解析,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视角上,基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情况,在罗默的“环境—努力”二元机会不公平理论框架下,构建量化高等教育机会的分析框架,定量刻画以机会不公平为核心的可及性、公平性与公平的公平性指标。第二,在研究内容上,考虑到城乡户籍制度在划分身份的同时,还在城乡之间筑起一道围墙,体现教育资源分配差异和学生成长差异,如果只分析整体的高等教育机会很可能将城乡的结构性差异掩盖,为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着重分析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丰富和完善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研究文献,不仅测度反映高等教育机会的指标,还借鉴不同的分解方法,系统分析环境变量对城乡机会不公平的贡献差异以及城乡间公平的公平性差异的来源,以为高等教育在普及化进程如何更好地兼顾可及性与公平性提供科学依据。

二、指标构建、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指标构建

将是否上大学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扩招以及其他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

① 路晓峰、邓峰、郭建如:《高等教育扩招对入学机会均等化的影响》,《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3期。

② J. E. Roeme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回归模型，见式(1)。

$$\ln \frac{p_i}{1-p_i} = \alpha + \sum_{j=1}^k \beta_j x_{ij} \quad (1)$$

首先，构建反映可及性的 C 指数(Coverage Rate，平均覆盖率)反映高等教育的可及性。估计式(1)得到个体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预测概率 p_i ，结合个体权重 w_i ，得到 $C = \sum_{i=1}^N w_i p_i$ ， $0 \leq C \leq 1$ 。C 指数越大，代表高等教育机会供应越充分。

其次，构建反映公平性的 D 指数(Dissimilarity Index，相异或机会不公平指数)反映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程度： $D = \frac{1}{2C} \sum_{i=1}^N w_i |p_i - C|$ ， $0 \leq D \leq 1$ 。D 指数越大代表机会不公平程度越高，如果每个个体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等于平均覆盖率 C，那么 D 指数等于 0，是理想的机会公平状态。

最后，将 D 指数与 C 指数相结合，构建公平的可及性指标——公平覆盖率： $HOI = C \times (1 - D)$ ， $0 \leq HOI \leq 1$ 。当高等教育机会达到全覆盖时，平均覆盖率等于 100%，机会不公平 D 指标等于零，HOI 指数等于 1；当个体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完全公平时，HOI 指数就等于平均覆盖率 C 指数。尽管该指数具有分布敏感性，但它是帕累托一致性的：任何群体获得的机会数量的增加总是会增加该指数。然而，分配敏感性也意味着，如果弱势(低于平均水平)群体获益，则对公平覆盖率的改善更大。纯粹重新分配既定资源并不足以加速社会福利的增长。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最新的 201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数据，该调查包含本文所需的人口学信息、教育史信息及其自述的家庭信息，满足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第一，样本年龄限定于 1960 年之后出生的个体，60 后和 70 后个体经历了 1977 年恢复高考后较为稳定的高考选拔时期，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群体则基本经历了 1999 年的高校扩招。由于出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群体面临高考暂停(1966—1969 年大学不招生，1970—1976 年实行推荐制)，不再纳入本文的分析范围。第二，删除基本信息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样本量 7599 个。

(三)变量选择

本文的核心变量为个体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二元变量。根据 CGSS2018 调查问卷中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划分，将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以及研究生学历归为接受高等教育，其余为非高等教育。在最终样本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有 1455 人，占全样本的 19.15%。

借鉴已有文献，将影响高等教育获得的环境变量划分为三类：社会层面、家庭层面与个体层面。由于努力变量的测度更为困难(比如学习的努力程度)，使用机会不公平的事前法测度机会不公平可以有效避免努力变量的测度问题。由于无法穷尽所有的环境变量，因此本文测算的机会不公平程度是真实值的下限。

社会层面变量主要包含与高等教育供给相关的环境变量：一是城乡户籍身份，本文用“14 周岁时的户口登记地”信息来划分城乡户籍，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不仅存在巨大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差异，农村的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要远远落后于城镇地区，同时教育是城乡流动的重要途径，农村居民通过接受教育留在城镇是户籍转换的主要渠道，这些居民获得非农户籍，进一步加剧城乡教育差距。当前的户籍状态往往包含了户籍转变，因此选择 14 周岁时的户籍状态更能纯粹地反映青少年时期城乡环境的影响。二是高校扩招变量，CGSS2018 问卷中没有直接询问个体是哪年参加高考，本文根据较为普遍的 6 岁入学，经历 9 年义务教育和 3 年高中阶段教育，在高考时的大致年龄为 18 岁，推断 1981 年及以后出生的个体享受到 1999 年高校扩招的红利。一般用出生年代的分类变量作为替代变量，由于扩招本身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将样本划分为 60 后、70 后、80 后、90 后，其中 60 后与 70 后不受扩招政策影响，80 后与 90 后受到了扩招政策影响。三是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反映各地区高等资源是否均衡分布，通常高等院校倾向于本地化招生，考虑各省份大学竞争力得分及排名，本文以得分在

60 分以上的为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省份^①。

家庭层面变量包括父辈的教育水平、学龄期父辈的职业情况以及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微观层面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简称 RCT)指出,在作出是否升学的决策时,家庭决策者从期望收益、成本与成功几率以及地位提升四个方面因素综合考虑,而这又受到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影响,如果家庭能从未来教育中获取的收益越多,继续求学的动机就越强;但如果需要支付的经济成本与机会成本越高,成功的风险更大,那继续求学的动机就会越小。显然,家庭背景越差(比如收入水平较低、社会阶层不高),承受失败风险的能力也就越低。一是关于父辈教育水平,现有研究表明父辈的教育水平往往会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子代的教育水平,这种传递既可能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家庭文化资本(比如学习氛围、学习热情)来传递,也可能是由父母的智力水平遗传。在具体衡量上,由于父亲、母亲的教育通常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将父母双方的教育、职业信息结合,本文将父辈教育水平分为两类,一类是父母双方均最多接受过初中教育;另一类是至少有一方接受过高中、高职及以上教育。二是父辈的职业往往与家庭经济环境相关,我们根据“您 14 岁时父亲/母亲的就业状况”问卷信息分为是否有一方从事非农就业。三是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用来补充反映学龄时期的父辈教育和职业之外的家庭信息,根据对“您认为您 14 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这一问题的回答,问卷将家庭等级分为 10 层,最低层为 1,最高层为 10,数值越大,表示自评的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越高。

个体层面的解释变量为性别。不同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度是导致教育获得领域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本文将性别作为个体层面的环境变量纳入分析框架,考察性别导致的高等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公平程度。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定义
高等教育	0.1915	0.3935	0	1	是否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是=1,否=0
城乡户籍	0.2748	0.4464	0	1	14 岁时城乡户口,城镇=1,农村=0
高校扩招	2.2488	1.0846	1	4	分类变量,出生年代 60 后=1,70 后=2,80 后=3,90 后=4
地区教育资源	2.0686	0.8154	1	3	分类变量,14 岁时户口所在地的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程度,匮乏=1,不丰富=2,丰富=3
父辈教育	0.2036	0.4027	0	1	父母受教育水平,至少一人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1,否则=0
父辈职业	0.4148	0.4927	0	1	14 岁时父母就业情况,至少一人从事非农就业=1,否则=0
家庭地位	3.4905	1.8050	1	10	分类变量,14 岁时家庭经济社会地位,1 为最低,10 位最高
性别	0.4641	0.4987	0	1	性别,男性=1,女性=0

三、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量化结果

可及性与公平性共同决定了上大学的机会大小。在高等教育机会供应仍然有限的情况下,多维度地量化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状况,是尽可能地推动城乡所有人以更加公平的方式获得高等教育入学

^① 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及得分分别为:北京,100;江苏,79.74;上海,75.74;山东,71.48;辽宁,71.48;广东,69.04;湖北,63.85;陕西,63.83;浙江,60.75。高等教育资源不丰富的地区包括四川、黑龙江、天津、河北、湖南、福建、河南、安徽;高等资源匮乏的地区包括吉林、江西、重庆、山西、云南、广西、甘肃、内蒙古、贵州、海南、宁夏、青海、新疆、西藏。

机会的前提。

(一)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分析

第一,高等教育城乡的平均覆盖率分别为40.95%和10.89%,城乡之间平均覆盖率的巨大差异意味着如果只考虑全样本的平均覆盖率,将会掩盖城乡之间高等教育机会获取的不均衡。扩招显著提高了平均覆盖率,C指数从60后群体的5.11%上升至90后的46.12%。那么,扩招带来的平均覆盖率的提升在城乡哪个群体中获益更大呢?对比扩招前后,农村平均覆盖率从3.29%上升到25%,仅略高于城镇扩招前的水平(24.24%),仍大幅低于城镇扩招后的平均覆盖率水平(61.63%)。从平均覆盖率的绝对差距角度来看,从相差20.95个百分点增至36.63个百分点,表明扩招拉大了城乡高等教育平均覆盖率差距。

第二,农村居民的机会不公平程度(46.55%)远高于城镇(24.89%),意味着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不仅面临更低的可及性,还面临更高的机会不公。扩招后机会不公平程度显著降低,D指数从60后群体的56.5%持续下降到90后群体的18.35%,下降幅度高达38个百分点。那么扩招带来的机会不公平的下降在哪里更明显呢?量化结果表明,扩招前后农村机会不公平的D指数从34.43%下降到17.51%,下降约17个百分点,而城镇机会不公平的D指数下降约20个百分点,扩招后的城镇机会不公平程度已经处于个位数水平。由此看出扩招导致的机会不公平的改善在城镇中作用更大。

第三,结合C指数和D指数,测算出公平覆盖率指标。农村居民公平覆盖率仅为5.82%,而城镇居民超过了30%;源于不公平程度的下降与平均覆盖率的上升,公平覆盖率水平从60后的2.22%上升至90后的37.66%。对于农村户籍居民,公平覆盖率指数从扩招前的2.16%升至扩招后的20.62%,与城镇扩招后的56.90%的绝对差距(超过30个百分点)进一步拉大。

上述分析意味着扩招不仅提高了城乡内部高等教育的可及性,同时降低了机会不公,但扩招带来的城乡可及性与公平性的改善程度不同,这种优势更多地被城镇居民捕获,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

表2 三类指数的测度结果

(单位:%)

	农村	城镇	60后	70后	80后	90后	农村 扩招前	农村 扩招后	城镇 扩招前	城镇 扩招后
C指数	10.89	40.95	5.11	10.98	28.69	46.12	3.29	25.00	24.24	61.63
D指数	46.55	24.89	56.50	44.51	31.12	18.35	34.43	17.51	27.21	7.67
公平覆盖率	5.82	30.76	2.22	6.09	19.76	37.66	2.16	20.62	17.65	56.90

(二)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程度分解

基于机会不公平(D指数)夏普利值分解的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城乡面临的机会不公平成因并不完全一致。对于农村居民,扩招对机会不公平的贡献率超过了一半,主要体现在不同年龄群体间(代际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公上;虽然在城镇居民中扩招的影响力也最大,但贡献率(45.55%)小于农村居民。在城镇居民中,父辈教育变量的贡献率突出(36.13%),父辈职业变量的贡献率偏小(8.17%);但农村居民父辈职业变量的贡献率更大(18.38%),父辈教育的贡献率(13.61%)还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地区资源与性别因素对农村居民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的影响大于城镇,意味着高等教育资源越是紧缺的农村,机会不公平问题越严峻;而农村居民往往受到教育预算约束与性别偏好的影响,导致的机会不公更加突出,这一结论与现有对重点大学的教育机会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结论一致^①。

扩招前后对比来看(表3的列3—列6),城乡户籍的贡献率保持稳定,影响力并没有随着扩招的推进而减弱,能够解释约1/3的机会不公平。扩招后高等教育资源不均衡的贡献率缓慢上升,从解释

^① 叶锦涛、汪立坤:《重点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性别差异》,《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5.27%增长到 8.88%，意味着扩招后教育资源的增加在地区间的分布更加集中化。从家庭层面来看，父辈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在 90 后群体中最为突出(32.12%)，而父辈职业变量的贡献率在 90 后群体中最低，家庭地位的影响力近年来在逐渐下降，意味着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性作用愈发突出。同时，性别的贡献率逐步下降。

我们进一步将城乡户籍变量和扩招变量交叉分组，发现扩招前后不同的环境因素的贡献率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农村居民扩招前后对比，扩招后的群体中父辈职业变量的贡献率增加了 20 个百分点，地区资源、父辈教育的贡献率也有所增加，而家庭地位与性别的贡献率分别减弱约 15 个百分点和 14 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扩招前后对比发现，80 后、90 后群体中父辈教育的贡献率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但父辈职业的贡献率增加超 10 个百分点，同时地区资源的作用更加明显。

表 3 对机会不公平的 D 指数夏普利值分解的贡献率 (单位:%)

	农村	城镇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农村 扩招前	农村 扩招后	城镇 扩招前	城镇 扩招后
	1	2	3	4	5	6	7	8	9	10
城乡户籍	—	—	34.13	33.43	36.01	34.09	—	—	—	—
扩招	53.70	45.55	—	—	—	—	—	—	—	—
地区资源	4.14	1.60	5.27	5.69	8.04	8.88	8.34	13.59	2.96	6.17
父辈教育	13.61	36.13	21.41	21.32	18.49	32.12	25.92	29.74	66.21	55.63
父辈职业	18.38	8.17	22.01	22.77	27.43	15.88	22.02	42.57	9.63	20.37
家庭地位	7.07	7.77	12.51	11.72	6.45	6.06	24.91	9.35	16.81	13.14
性别	3.09	0.78	4.67	5.07	3.58	2.96	18.80	4.76	4.38	4.68

四、进一步分析：城乡公平覆盖率的差异分解

对于城乡扩招前后公平覆盖率的差异是由于机会的增减还是由于不公平的升降导致，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指数分解来识别。公平覆盖率的变化可以分解为覆盖率的变化和不公平的变化，同时还应该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动。我们采用反事实的思路，将公平覆盖率差异分解为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与覆盖效应(Coverage Effect)，其中结构效应主要反映环境因素差异；覆盖效应则反映特定环境集内覆盖率差异。覆盖效应进一步分解为均等效应(Equalization Effect)与规模效应(Scale Effect)。提高覆盖效应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偏向弱势群体的政策，通过提高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覆盖率来降低机会不公平程度，称为均等效应；另一种是同比例提高所有群体的覆盖率，机会不公平程度保持不变，公平覆盖率仅由于平均覆盖率的提高而增加，称之为规模效应。

分解结果见表 4 所示。可以发现，无论是何种差异分解，三种效应均为正，虽然具体数值有差异，但始终是覆盖效应为主，结构效应为辅。在覆盖效应中，规模效应高于均等效应，表明机会不公平的改善主要依赖的是高等教育机会可及性与公平性的改善，尤其是整体可及性的提高，而环境因素本身的改善作用较小。上述结论意味着我国未来要更加注重消除环境变量造成的不可控影响，尤其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更为均等化的教育资源，这可以更为高效地提升公平覆盖率。

具体而言，从城乡比较来看，城镇高等教育获得的公平覆盖率高于农村的部分中，结构效应解释力度为 30.58%，规模效应(44.95%)比均等效应高出约 20 个百分点。一般而言，城镇内部结构效应背后的环境差异要小于农村，并且在高等教育获得上可及性差距比公平性方面的差距更大(参见表 2)。扩招前后公平覆盖率的差异分解中，结构效应就更小了(14.57%)，从时间维度看环境变量的改善更小；扩招后高等教育的供应大幅提高，规模效应可以解释近一半的差异，均等效应的贡献度超过了 1/3。从城

乡差异的横向分解与扩招前后的纵向分解对比来看,横向的城乡之间的环境变量差异更大,而纵向的扩招前后的变化较小。

从扩招与城乡的双重维度来看,城乡之间的差异在扩招前后有了明显区别。相比于扩招前,扩招后结构效应提升了约12个百分点,而规模效应与均等效应分别下降约八个和四个百分点。扩招后,城乡间的环境因素本身的差异更加明显,而由于高等教育机会的大幅增加,在城镇获利的同时,农村居民上大学的机会也得到很大提升,规模效应有所下降。而对于扩招前后的差异原因,城镇的绝对量差异更大(如表2所示),其中结构效应的解释力度也更大(20.36%),城镇中环境因素本身的改善更加明显;城镇中规模效应(55.28%)与均等效应贡献率(24.36%)分别比农村少约九个和五个百分点。农村扩招前后环境因素改善作用很小,表现为结构效应贡献率仅是个位数(6.38%)。

表4 公平覆盖率差异的分解

(单位:%)

	城乡差异分解	扩招前城乡差异	扩招后城乡差异	扩招前后差异分解	农村扩招前后差异	城镇扩招前后差异
结构效应	30.58	24.42	36.84	14.57	6.38	20.36
覆盖效应	69.42	75.58	63.16	85.43	93.62	79.64
其中:规模效应	44.95	61.88	53.36	49.69	64.09	55.28
均等效应	24.48	13.70	9.80	35.74	29.53	24.36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将机会不公平的“环境—努力”理论运用到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研究中。考虑高校扩招背景下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因素,基于CGSS2018年数据测算城乡居民扩招前后高等教育获得的可及性、公平性与公平的可及性,对机会不公平的来源进行夏普利值分解,并进一步分析公平的可及性中城乡差异根源,以期对我国未来高等教育普及化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兼顾可及性和公平性提供理论依据。

从高等教育可及性来看,农村远低于城镇,农村高等教育可及性和公平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平均覆盖率差异,城镇居民可及性显著高于农村;扩招显著提高了可及性,但从扩招前后平均覆盖率的差异来看,扩招带来的更多教育机会被城镇居民更多地捕获,扩招后平均覆盖率的城乡差异不减反增。在公平性方面,需要将44.19%的高等教育机会进行重新分配才能改善机会不公平。农村居民的机会不公平程度显著高于城镇,扩招后机会不公平显著下降,扩招导致的机会不公平的改善在城镇中作用更大。因此,扩招带来的可及性与公平性方面,城镇居民获利更多,反映在指标上,即扩招后城镇居民公平覆盖率指标的提升幅度更大。

量化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的引致因素是促进机会公平的前提。随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增多,城乡户籍的贡献程度仍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城乡居民之间、扩招前后居民之间面临的机会不公平的成因存在差异性:城镇居民中代表家庭文化资本的父辈教育水平贡献率比农村更高,扩招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的机会不公平比扩招前高。从公平覆盖率的差异来看,以能够改善可及性的覆盖效应为主,进一步分解发现可及性的普遍提高表征的规模效应要高于改善机会公平带来的均等效应。环境因素本身的差异带来的结构作用较小,则限制了公平覆盖率的改善。

在未来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需要进一步增加弱势群体的入学机会,在扩大覆盖面的同时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以教育公平促社会公平,最终畅通社会流动渠道。

对于农村地区,有三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大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教育最

具有延续性,能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础教育质量。良好的基础教育是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前提,应在基础教育阶段减小教育机会不公平的累积,这也是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应有之义。二是完善农村学生资助政策。父辈就业情况、家庭经济地位对农村居民教育机会不公平的贡献率很高,高校扩招伴随着教育经济成本与机会成本的上升,但短期收益降低、教育系统的筛选性进一步加强,低收入家庭不得不进行权衡取舍,可能导致其子女主动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家庭经济条件也影响个体的营养、健康与大脑发育,因此在各个教育阶段需要提高贫困生识别的精准性并增大资助力度,以公共投入的增加来降低私人教育投资的约束。否则在教育对于工资性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的背景下^①,教育不公平将会向收入这一教育的结果方面转移,形成更大的收入差距。三是应继续加大高考招生对农村的倾斜力度,尤其是对高等教育资源不丰富的地区更应如此。

对于城镇地区,需着重降低教育代际传递,缩小高学历家庭与其他家庭子女之间的早期教育投资差距。公共教育投资应倾向于低教育水平或低收入家庭,同时逐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在居住地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提高基础办学条件、办公经费、人员经费及教师聘用与待遇的投入等方面的均等化程度。让家庭文化资本积累不足的群体能够通过享受更多的公共教育资源来尽量弥补其在获得高等教育中的劣势。

(责任编辑 孟大虎 责任校对 孟大虎 武晓阳)

The Differ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under the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LI Ying¹, WANG Qi²

(1.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 and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2. 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effort”, this paper quantifies 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s from accessibility, equity and equitable accessibi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uses different decomposition methods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has led to the varying degrees of improvement of the accessibility, equity and equitable accessibilit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mong them, the change rang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larger, and the benefits brought by the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lment have better been enjoyed by urban groups, which has further widened the gap between urban-rural accessibility and equity. Further analysis has shown that the ine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caused by hukou has not weaken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continuous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The scale effect brought by the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lment has taken the first place, followed by the equalization effect brought by the improvement of opportunity equity. The structural effect brought by the differ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mselves is smaller, which has limit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equitable accessibility of rural residents.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urban-rural differences;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accessibility; equity

^① 李实:《缩小收入差距 促进共同富裕》,《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5期。